

明清文化史散論

馮天瑜
著

華中書院出版社

DA54/21

K248/4 ✓

明清文化史散论

冯天瑜 著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000582

明清文化史散论

冯天瑜 著

责任编辑 肖川

•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湖北省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17,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7255—003 定 价 3.00 元

目 录

序·····	邱汉生 (1)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5)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5)
二、中国文化史大要·····	(10)
三、明清文化的特点·····	(20)
明代理学流变考·····	(33)
一、明以前理学发展大势·····	(33)
二、初明——理学的“述朱期”·····	(39)
三、中明——王学的形成和兴盛期·····	(41)
四、晚明——王学变态期·····	(49)
《郁离子》与元明之际的社会矛盾·····	(58)
一、《郁离子》写作前后刘基的政治态度·····	(58)
二、《郁离子》对元朝弊政的揭露·····	(63)
三、《郁离子》所阐发的社会政治主张·····	(72)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历史评价·····	(81)
一、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	(81)
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87)
三、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成就·····	(93)
四、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与唐宋古文运动之比较·····	(101)
“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	(112)
一、市民——文学的新主角登场了·····	(113)
· 直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	(120)
二、明代中晚期城乡经济状貌的艺术写照·····	(126)
四、中世纪婚恋模式的突破·····	(132)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142)
一、耶稣会士的东来·····	(142)

二、学术传教——利玛窦的立足办法·····	(144)
三、利玛窦译介的西方学术论著·····	(150)
四、利玛窦学术活动的局限性·····	(154)
五、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157)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	(162)
一、力主“经世致用”，反对空疏学风·····	(162)
二、博采外域知识，会通中西·····	(163)
三、数学语言和实证道路·····	(171)
王夫之理性主义历史观探微·····	(173)
一、对古代史论旧说的清算·····	(179)
二、“势、理、天合一”的历史观·····	(188)
三、夫之史观的理性主义特征·····	(198)
王夫之创见三题·····	(203)
一、包蕴着“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思想萌芽的“元气不 灭”论·····	(204)
二、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的假说·····	(212)
三、“文化中心多元论”和“文化中心转移论”·····	(216)
王夫之的文质观与文明演进论·····	(221)
一、“敦实崇质”基础上的重文思想·····	(221)
二、由禽兽到人类，由夷狄之“野”到华人之“文”的文明演 进论·····	(228)
从晚周民本思潮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239)
一、民本思潮的源头·····	(239)
二、《左传》和《孟子》对民本主义的阐扬·····	(245)
三、《明夷待访录》对晚周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53)
四、《明夷待访录》对中世纪各种异端思想的采摭·····	(259)
五、《明夷待访录》并非本时代的孤儿·····	(264)
《明夷待访录》题义诠释·····	(269)
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	(276)

一、宽阔的文化观念·····	(276)
二、重视对风俗的研究和改造·····	(282)
三、注重古典学术的考订和阐发·····	(238)
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对明代文化的影响·····	(296)
一、明代宦官干政的历程·····	(297)
二、宦官与封建统治集团其他成分的关系·····	(303)
三、宦官与民众的尖锐对立·····	(308)
四、宦官干政给明代文化打下的烙印·····	(314)
明清文字狱述略·····	(326)
一、朱元璋的忌讳与明初的文字之祸·····	(326)
二、对汉民族意识的恐惧与清代的文字狱·····	(331)
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清代盛产借文字狱升迁的 奸人·····	(338)
四、文字狱对明清文化发展的桎梏·····	(341)
明清类书丛书编纂评述·····	(344)
一、盛大朝代的盛大事业·····	(344)
二、明清类书丛书的编纂特点·····	(346)
三、明清类书丛书与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之比较·····	(358)
近代文明的传播与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 关系·····	(368)
一、“湖北新政”与湖北地区的近代文明·····	(369)
二、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催化剂”作用·····	(379)
后记·····	(389)

序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封建统治露出了崩解的端倪，但是还很坚固。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但是十分稚嫩。这是时代的特点。明清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特点下发展着的。

冯天瑜同志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书的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各个领域，视野很宽广。它是通过若干具体问题的阐扬，反映这个宽广面的，论述很丰满、深刻。名曰“散论”，实际是有脉络可按，有统系可寻的。这只要翻读目录就可以得到印证。这样的著作，当前还不多见，确是读者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等史著之外所想寻求的书籍。

《明清文化史散论》的时代断限，起自明初，迄于辛亥革命清社覆亡，凡五百四十四年。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时代已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称“明清”，是以朝代标志，则亦无妨。书中论哲学思想的，有明初的朱学，有元明之际的《郁离子》，有明中期的王学及尔后王学的流变，有明末清初王、黄、顾三先生的学术思想。论文学的，有明代的“台阁体”及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有明中期以后的市民文学“三言”、“二拍”。论科学技术的，有明末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学术，有徐光启在学术上的会通中西，以及王夫之自然观方面的创见。论文化政策的，有明清文字狱，有明清类书、丛书的编纂。这样，就清晰地勾勒了明清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这个轮廓既是属于封建末世的，也带有新的城市平民的生机；既反映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也说明其中有新输入的西方学术的涓涓细流。在卷帙浩繁的

《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旁边，出现了《几何原本》、《名理探》等西方著作的译本，及西洋传教士编绘的世界地图。这就透露了明清文化的时代消息。

《明清文化史散论》的不少论文写得很深刻，抉发了问题的本质，给人以诸多启示。例如把《郁离子》放在“元明之际”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使书中的寓言和故事得到恰当的政治说明，这就颇具卓识。论“台阁体”及前后七子的复古诗风，不仅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同，还在引严羽诗以汉魏盛唐为师、戴表元复唐音的理论之后指出，“复古”乃是对点缀升平的“台阁体”的革新。这不能不说是别具慧眼的。《“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是一篇力作，论证明中叶后“市民文学的勃兴”，指出“三言”、“二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工商业者的形象再也不是受人凌辱的下等人，再也不是猥猥琐琐的可怜虫，他们以正面形象扬眉吐气地站立在读者面前。论文又说：“三言”、“二拍”所表现的带有近代意味的生活图景，其清晰程度是空前的。“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象一片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早春季节将要来临。”这些生动的语言，使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论证更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书里赞扬了顾炎武的风俗论，“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认为这位先哲的理论“已孕育着某些唯物史观的萌芽因子”。《从晚周的民本思潮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出，黄宗羲在否定封建帝王的“一家之法”的前提下，向往建立一种“未尝为一己而立”的公法。这种公法将保护民众“各得其私，各得其利”。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己之法的法治思想，是孟子“听政于国人”一类观念的跃进，直逼近代法治观的边缘。《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恰当地评价了耶稣会士所传入学术的价值，又指出徐光启也已隐约觉出，这些外国传教士“犹世局中人，其种种有用之学，乃其秘密家珍”，是居为奇货而不肯

轻以传人的。这些论断很精辟，是在绵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是有价值的。冯天瑜同志努力探索植根于政治经济的明清文化，书中随处闪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灼然光耀。

早些年我就知道冯天瑜同志，但至今并未识面。这次他要我为他的《明清文化史散论》写序文，我欣然应允了。我穷日夜之力一口气把它读完。如嚼冰梨，如沐清晨的爽气，我为书内可贵的探索，精辟的论断，清晰、明快的文风所吸引。读这样的书，是一种知识的享受，也是一种美好的文学享受。我认为这确是一部好书。

冯天瑜同志对文化和文化史涵义的阐释，是切当的。今后沿着这个路径走去，我期望他能够写成更丰硕的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解放前，柳翼谋^①先生著有三卷本《中国文化史》，史料翔实，断制谨严，观点虽是旧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冯天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治中国文化史，成就自当超过前人，即以书中引据浩博而论，已足以与柳先生方轨。一九三六年夏，我读书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时柳先生为馆长，每日见其从早至晚安坐书室，把卷不息，勤谨令人叹服。这个动人的形象深印我的脑际，至今将及半个世纪，犹鲜明如昨。一九七一年，我再游南京，柳先生已谢世多年，惓惓怀旧，我写了《白门杂诗》，其中一首七绝是怀念他的：

鲁酒难寻周雁石，书城长忆柳诒徵。

乌龙潭水娟娟净，空印清宵一片冰。

一九三六年，周雁石君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工作，我临归，他置酒饯行，故诗中兼及。我想，诚笃勤奋的学者给人的印象是极为

^①柳翼谋(1880—1956)，即柳诒徵，江苏镇江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和爱国主义者。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女子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史学教授，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著《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版本概论》、《国史要义》等书，其中尤以《中国文化史》为传世之作。

深刻的，虽历数十年而犹不能去怀。读冯天瑜同志的《明清文化史散论》的这十多天来，我总不时想起柳先生，想起柳先生的著作，因在序文之末，缀此数言，以志我的一段心印，且以寄厚望于天瑜同志。

邱 汉 生 谨 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在近代赋予了新涵义的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

《尚书·序》曰，“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指文字；《尚书·大禹谟》曰，“文命敷于四海”，称颂大禹以文德布陈于四海，这里的“文”，指文德教化。《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处“文”与“德行”对应，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或谓“六艺之文”。《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为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人为形态胜于自然形态的谓之“史”，人为形态与自然形态彼此切合，就符合君子的风貌了。在这里，“文”与“质”对称，具有“修饰”、“人为加工”等含义。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的贲卦《彖传》开始把“文”与“化”联系起来使用：“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在《易正义》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宋代理学家程颐在《易传》中则说：“人文，人伦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

俗。”此处所谓“人文化成天下”可简写作“文化”，含有以“文”来“教化”天下的意思。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较宽泛的文化观。他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①清儒彭申甫对文化也有类似的解释：“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则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②

总之，中国古籍（主要是儒家典籍）里的“文化”，指诗书礼乐、政治制度、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古人还往往把“文化”指作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和，如《说苑·指武》曰：“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如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些用法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化”在含义上有近似之处，但又颇相差异。

至于近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拉丁文Culture（拜神，耕作）意译而来。它含有广义与狭义的双重内容。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此外，考古学上的“文化”，则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的总体，通常以首次发现地点或特征性的遗迹、遗物而命名，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史的任务。既然“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因而“文化史”也就必须作相应的区分。广义文化史，指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与社会发展史相近似；狭义文化史则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发展史，也即精神文化及精神文化的物化现象的发展史。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思

①《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②《易经传义·解注辨正》。

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当然还要由此主干旁及思想学术的物化现象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多以政治、军事演进为主要内容，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①但我国古代学术及史学著作也有关于诸子、艺文、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如《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史记·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刘歆的《七略》，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至于近古学者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已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欧洲古典史学描述的对象是战争，以及由战争旁及到的政治活动。因此，恺撒等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就是史学家。欧洲中世纪史学更有忽视文化史的倾向，犹太史、教会史构成其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与教廷和贵族推行神学蒙昧主义直接相关。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最先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范畴。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史》展示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文化发展的成就，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有专章论述，这在史书中是开创性的作法。在《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1756年出版）一书中，他针对欧洲中世纪史学的只重政治军事的偏颇，指出历史学的范围不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还应当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历史。基于此种认识，伏尔泰提出撰写文化史的任务，并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后两百年间，欧洲资产阶级史学家编著的文化史大批涌现。我国在“五四”以后翻译介绍欧、美、日文化史著作甚多，有些学者还仿此体例编写了若干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近古和近代学术文化史的开创性作品。柳诒徵、陈登原等先生更分别编著大部头的《中国文化史》，

^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0页。

至今读来，仍给人启示良多。此外，日本、英国学者也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但多失之于粗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文化史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广义文化史的杰作；列宁关于把文化看成人类创造的知识总汇的思想以及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近代文明的解剖刀；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研究文化现象和中国文化史的指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季米特洛夫，也有许多文化史方面的专论。鲁迅的早期论文不少涉及文化史，中后期杂文更多有文化史方面的精彩论述，如他赞扬列宁“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观点，并号召文化工作者“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①。这都是我们研究文化史的指导性箴言。

解放以后，由于广义文化史被社会发展史所取代，狭义文化史则分解到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史学史、文学史、科技史之中，很少有人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综合性研究。这样，三十余年来，虽然文化史的各个分枝研究大有进展，但文化史专论却寥若晨星，文化通史、文化史概论、断代文化史，更成为空白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笔者出于引起时贤注目于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的意愿，拟从狭义文化史着眼，探讨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明清两代发展的若干环节，考察这几百年间中华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迁，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有着怎样的进展，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和风尚的异动状况，以求窥见这一阶段文化的特色和发展大势。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

①《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些经典性的论述昭示了一个道理——文化史是与经济史、政治史交相渗透、互为表里的，研讨文化史不可不兼及经济史、政治史，也就是说，狭义文化史应不断从广义文化史那里获得启示，吸取营养，受到检验，而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研究文化史除了必须注意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之外，还有若干方法论问题值得探讨。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曾概括了三条：一，“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这三条均属比较方法，是治文化史所必用的。当然，王国维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古史，他特别重视“地下实物”（考古资料）与“纸上遗文”

（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这就是王氏所称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对于古文化史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王氏在殷周史的探索中别开蹊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重证据法”。但对于中古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而言，则更应注重精神、意识的物化——文献资料，注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献材料的参酌比较。这也就是近世西方学者所倚重的比较研究。据笔者的体会，从事明清文化史的研究，应当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纵的比较，指的是将明清文化现象同上至先秦，下至近现代的文化现象作比较；横的比较，指的是将中国明清文化现象同周边各国以及欧洲的文化现象作比较。通过纵横两种比较，可以窥视明清文化的来龙和去脉，

①《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并洞察各国度、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当然，研究文化史的基本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①遵照这一方法论原则，我们在探讨精神文化及精神文化物化现象的历史时，第一，应当把握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与整个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在文化史的研究过程中，既要防止忽视逻辑的倾向，切勿把文化史描绘成没有内在统系的碎金断玉的缀合；又要防止把文化史抽象成缺乏历史实在性的概念进程。

二、中国文化史大要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的、曲折多致的历程。明清两代的文化，是上古和中古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近代文化的前奏。因此，研究明清文化，不可不对整个中国文化史作一通盘考察。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三个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以来，又产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历史阶段都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历史，当然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二性对第一性的从属关系。根据文化自身演进的历程，文化史有它独特的脉络和轨迹。

中国文化史应当如何分期，目前尚未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以为，在作这种分期时，首先要注意中国文化特有的延续性。世界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其文化曾昌盛一时，但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后来都中断过，使人产生“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去楼空”的感慨；而中国文化自殷商以来，代代相承，虽然多有曲折，却从未中断。仅以文学为例，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此伏彼起，高峰叠见，确乎蔚为大观！具有无比强大的延续力，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和优点。黑格尔在比较各个文明古国之后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①正因为中国文化是延绵不断的，我们在考查中国任何一个断代的文化时，都应探幽溯远，考其源流。其次，还要注意到各民族的文化不是孤悬于世界文化总体之外的，它是不断摄取并消化周边各族文化，并将自己的影响施加于周边诸民族。如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就囊括了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个文化系统在两汉时期又吸收了西域文化；两汉、魏晋以降，还输入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明末之后，更有欧洲文化注入。因此，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复合体，而决非一个封闭式的系统。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文化史上的一条“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的通则——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②。

基于文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文化史划分为七个段落。

（一）史前——华夏文明的孕育期。

（二）殷商到西周——神权居统治地位的官学文化阶段。华夏文明的发育期。

（三）春秋战国——以民本思潮为旗帜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兴起。华夏文明的昌盛期。

（四）西汉到明中叶——以儒学为正宗的封建帝国文化阶段（其内又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儒佛相混的宋明等四个段落）。

①《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

②《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